

西南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 学术文丛 |

高等教育与居民的 生活满意度

基于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张 明 张学敏 / 著

 科学出版社



卷外读

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学术文丛

高等教育与居民的生活满意度： 基于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张 明 张学敏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追求满意的生活是人们普遍的愿望,高等教育作为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本提升的重要环节,在改善国民收入状况、综合素质以及提高国民的生活满意度方面一直被寄予厚望。本书研究立足于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而居民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提升的现实背景,分析高等教育影响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机制与渠道,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重点考察高等教育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特别是从居民幸福感、收入满意度、社会阶层、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等五个维度揭示高等教育影响居民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

本书适合公共管理、教育学与经济学领域相关教学科研人员及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阅读,也适合于一般教育工作者等相关人员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等教育与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基于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张明,张学敏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6

(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学术文丛)

ISBN 978-7-03-057283-7

I. ①高… II. ①张… ②张… III. ①高等教育-关系-居民-生活满意度-研究 IV. ①G64②C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3391 号

责任编辑:刘英红 易嘉宁/责任校对:赵桂芬

责任印制:吴兆东/封面设计:黄华斌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年6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B5

2018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7 3/4

字数:200 000

定价:6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前言

追求满意的生活是人们普遍的愿望，美国宪法将对幸福的追求作为基本的公民权利，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认为社会应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逐步成为政策制定者的主流话语。“幸福停滞”的经济增长被学者发现（Brockmann et al., 2009），更是触发了学界和决策层的警惕。读书或者说获得更高的教育向来被认为是获得幸福的重要途径，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近些年我国教育事业迅速发展，人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升，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比例从 1985 年的 13.5% 提高到 2015 年的接近 40%，全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不到 6 年提高到 2015 年的 10 年左右。高等教育发展更为迅猛，1985 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学生数为 170 万人，而到 2016 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学生数接近 2700 万人^①。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及其普及化的发展趋势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高校毕业生越发面临严峻的就业压力，教育的成本投入与教育的收益之间似乎出现某种不平衡，高学历人群工作和生活压力加大，拥有更高学历的人尤其是生活在大型都市中的白领人群不幸福感上升。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国民幸福报告 2014》显示，整体来看，学历程度更高的人更不幸福，幸福指数最高的是小学毕业生，博士的幸福感相对较低。

纵观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国际社会经历了以体能为支撑的农业经济时代、以技能为支撑的工业经济时代，发展到当今以智能为支撑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类在走向知识经济的时代，社会发展中的一切成员必将以极大的热情通过追逐知识资本来确立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面对职业岗位中知识和技术含量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企盼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谋求一份稳定而高薪的工作，获得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不断完善自身规划，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各级各类大学毕业生，有力支持了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一大批青年渴求高深知识和求学转变命运的愿望。但是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着培养对象不清、服务方

^① 数据来自 2017 年《中国统计年鉴》。

向不明和办学层次混乱等问题，许多高校盲目攀高升格、扩大规模、抢办热门专业、追求“大而全”，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到了高等教育的培养质量。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当今时代，对于我国广大农村青年学子来说，通过读大学来实现“金榜题名”，“鲤鱼跳农门”的愿望也不像以前那么强烈了，而近年的金融危机，更使大学生就业难成为社会问题。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使许多人对高等教育的功能产生了怀疑，并且同样的时代，也有一些中途弃学的低学历者通过自我奋斗创造了非同凡响的业绩，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高等教育的经济效应开始模糊化。

追求满意的生活是人们普遍的愿望，高等教育作为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本提升的重要环节，在改善国民收入状况、综合素质以及提高国民的生活满意度方面一直被寄予厚望。本书研究立足于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而居民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提升的现实背景，借鉴人力资本理论、教育的选择功能论、教育的再生产理论、社会分层流动理论和高等教育社会功能理论，分析高等教育影响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机制与渠道。进一步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的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方法，重点考察高等教育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特别是从居民幸福感、收入满意度、社会阶层、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等五个维度揭示高等教育影响居民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半参数 Probit 模型、Oaxaca-Blinder 分解及夏普里值分解、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实证研究发现，高等教育会增进居民的幸福感，但中西部地区教育增进幸福感的主要作用机制体现在教育的收入效应上，而东部地区这种影响机制更主要表现在教育带来的健康状况改善上。同时，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体，收入满意度也更高，在工资分配机制更为灵活的非国有部门，高等教育对于个体获取满意的收入的作用更突出。高等教育对居民的社会网络依然有显著的增进效用，并且成长在农村地区的接受高等教育的居民对于社会网络的培育与维系时间投入更多。另外，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确实拥有更高的社会阶层评估。但如果剔除家庭背景带来的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差距，高等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能力明显弱化。高等教育能够增进居民的社会信任，但对于“80后”和“90后”等高考扩招后接受高等教育的居民而言，高等教育对他们的社会信任感提升并不显著。

本书探讨了高等教育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及其特征，分析高等教育影响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基本规律，丰富了高等教育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理论，为深入进行高等教育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本书研究也为理解中国的“幸福停滞”现象提供新思路。“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paradox）一直是幸福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到目前为止，“伊斯特林悖论”及引发的“幸福停

滞”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仍然没有得到合理解释，本书将从中国高等教育功能出现的问题角度，提出理解中国的“幸福停滞”现象的新思路。同时，本书在厘清高等教育影响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机制与路径基础上，能为缓解高等教育功能异化，增进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提供决策支持。

本书的出版受到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项目（编号：SWU170925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创新团队项目（编号：SWU1709124）、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16ZDSH04）资助，在本书的撰写与出版过程中，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各位领导与老师给予了诸多指导、支持和帮助，由衷表示感谢！研究过程中也参阅和吸收了相关专家、学者的成果，在此一并致谢。

张 明

2018年1月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高等教育与居民生活满意度：理论与现状	1
第一节 高等教育与居民生活满意度关系的理论基础	1
一、人力资本理论	1
二、教育的选择功能论	3
三、教育的再生产理论	5
四、社会分层流动理论	6
五、高等教育社会功能理论	10
第二节 高等教育影响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理论机制	11
一、高等教育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及特征	11
二、高等教育影响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基本规律	13
三、高等教育影响居民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	14
第三节 中国居民生活满意度变迁与高等教育发展	16
一、中国居民生活满意度变迁	16
二、中国居民接受高等教育情况	26
第四节 本章小结	29
第二章 高等教育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30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30
第二节 实证研究设计	32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34
一、半参数有序 probit 模型估计方法	34
二、估计结果与讨论	35
第四节 结论与政策含义	38
第三章 高等教育影响居民收入满意度的实证研究	40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40
第二节 理论框架与实证研究设计	42
一、理论框架	42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设计	43

第三节 模型初步分析	45
第四节 高等教育变量内生性的处理及贡献的测度	48
一、高等教育变量内生性的讨论	48
二、基于 R^2 的夏普里值分解	50
第五节 结论与政策含义	51
第四章 高等教育影响居民社会阶层的实证研究	53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53
第二节 数据来源和变量描述	54
第三节 模型初步分析	57
一、有序 probit 模型参数估计	57
二、有序 probit 模型半参数估计	61
第四节 内生性的处理及贡献的测度	64
一、高等教育内生性的讨论	64
二、家庭过去社会阶层内生性的处理	66
三、高等教育贡献的测度	68
第五节 结论与政策含义	71
第五章 高等教育影响居民社会信任的实证研究	73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73
第二节 样本与数据	75
第三节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77
第四节 分组检验结果与分析	79
一、城市和农村不同成长背景居民的分组检验	79
二、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分组检验	81
第五节 结论与政策含义	83
第六章 高等教育影响居民社会网络的实证研究	85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85
第二节 理论模型与变量设计	87
一、理论模型	87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88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90
一、估计结果与分析	90
二、城乡不同成长背景群体的分组比较	93
三、倾向得分匹配估计	94

四、Oaxaca-Blinder 分解	97
五、进一步讨论：不同年龄群体的分组估计	99
六、实证结果总结与分析	101
第四节 结论与政策含义	102
参考文献	104

第一章 高等教育与居民生活满意度：理论与现状

追求满意的生活是人们普遍的愿望，高等教育作为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本提升的重要环节，在改善国民收入状况、综合素质以及提高国民的生活满意度方面一直被寄予厚望。本章将借鉴人力资本理论、教育的选择功能论、教育的再生产理论、社会分层流动理论、高等教育社会功能理论，找出高等教育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相互关系、规律。并从居民幸福感、收入满意度、社会阶层、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等五个层次界定高等教育影响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内涵，进一步揭示高等教育影响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收入机制、健康机制、信任机制和心理机制。同时基于一项大型的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数据，即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考察自 2003 年以来中国居民受教育程度与主观生活满意度的变迁情况，揭示新时期居民高等教育及生活情况的发展变化。

第一节 高等教育与居民生活满意度关系的理论基础

一、人力资本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 1676 年首次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他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中，拓展了劳动创造价值的来源，在传统土地、物质资本和劳动三要素的基础上，提出了第四要素“技艺”。劳动价值“四要素”论的提出，使威廉·配第成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开山鼻祖，成为早期研究人力资本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并首次完整、科学的对人力资本进行定义，指出资本不仅包括能够提高劳动效率、节省人力的硬件设施（如机器、工具等），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熟练程度也是重要的资本形式。

近代以来，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经典论著《经济学原理》进一步拓展对人力资本的研究，将人力资本研究视角集中在家庭内部，提出家庭人力资本理论。家庭人力资本的投资过程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并且深受货币性因素及家庭环境等非货币性因素的影响。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经济学理论不断丰富，学术界涌现出了很多致力于研究人力资本的学者，阿尔弗雷德·洛特卡和达布林

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人物，他们结合自身的研究特长和背景，通过将统计学、经济学引入到分析框架，创造性地对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中的个人收益现值进行定量分析，改变了对人力资本的传统定性分析，开创了对人力资本定量研究的先河。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教授首次采用“费用-效益”的分析方法，从个人视角对教育的投入-产出进行比较，最终取得教育这种人力资本投入的收益率，这种方法使得人力资本的概念更加清晰、更容易被理解，人力资本的成本核算方面也更为科学。

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进一步发展，学术界对人力资本的研究迈上了新台阶，并取得一系列重要突破。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对已有的人力资本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系统并全面阐述、发展了人力资本理论，对人力资本进行了重新认识，认为人力资本是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所投入的知识、技术、创新理念、管理方法的统称。人力资本附加于劳动者个人身上，其使用过程就是契约建立的过程，即企业的财务资本和个人的个人人力资本进行融合的过程。在以世界多个国家农业经济为研究样本时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要远远高于物质资本。这一结论被后来的经济发展所证实，也在学术界被广泛接受。

现有人力资本理论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上看，资本主要表现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相互替代。由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成本-效益方面的差异，二者进行组合可以达到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目的，但前提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达到最佳的配置状态。举例来说，在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中，德国、日本等国家先于其他国家恢复经济，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其中的缘由值得深入思考。其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人力资本，这暗示出教育、医疗、人口流动等非物质资本在促进经济恢复并维持经济调整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物质资本不可替代的角色，从侧面反映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微观上看，个人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入可给个人带来积极的回报，通过增加教育等人力资本投入，不仅可带来个人人力资本存量增加，还可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水平，同时对未来就业和收入产生良好的预期。进一步提高个体劳动者控制各资源的能力，使自身的各种生产要素达到最佳配置，这反过来也会促进个人或社会的发展。通过大量的研究也发现，个人投入不同程度的教育人力资本时，其劳动生产率、收入水平也会不同。较高的教育水平，通常会带来较高的生产率和收入。此外，教育等人力资本的投入对缩小社会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和谐意义重大。

二、教育的选择功能论

学术界一般认为,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是教育功能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虽然涂尔干对于教育平等问题的讨论着墨不多,但却为后人对于教育本质的探索进行了启迪。20世纪40年代,基于教育功能主义视角,帕森斯在教育与平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在其1971年出版的专著《现代社会体系》中进一步对教育进行了论述。他认为,19世纪、20世纪发生的教育革命对现代社会基本架构的影响与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同等重要,教育革命对社会结构的冲击大大削弱了市场和官僚组织的作用。比如,个人如果没有通过先前教育人力资本投入获得的学历,仅凭自身的努力就想达到经济上的成功是小概率事件。帕森斯认为,教育革命给人们带来了教育机会的平等,扩大了获得教育的途径。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个人学习能力以及家庭观念等异质性的存在,教育机会平等带来的回报上也是有差异的。虽然家庭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性别、年龄等存在先天性的差异,但经过教育的改进会引起自致角色的分化。具体来说,当个人从儿童进入启蒙教育阶段时,社会经济地位和年龄都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学校和教师在教育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但都基于教育机会的公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为承担教育传播重任的学校为个人教育提供均等的机会,作为传播知识的教师则对学生的学业有同样的期待,因而也为机会平均作出贡献。然后,教育机会的均等并不意味着学业成绩乃至学业等级的相等,因为这源于学生个人的天赋及后天的努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即使在同一所学校接受同样的教育机会也会产生学术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构成了异质教育资格的自致性地位,成为未来社会地位划分的重要依据。因此,教育资格引致的自致性角色能否取代原有的先赋角色,这取决于置换过程中的学生成绩及教育年限。言外之意,教育产生了新的不平等。但由于教育的社会化功能,“由教育成就上的差异造成的不平等是合理的”的观点又被广泛接受。

基于功能主义,拉尔夫·特纳和厄尔·霍珀对教育平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特纳在其论文《赞助性流动与竞争性流动:教育使社会地位升迁的两种模式》中就教育与社会流动关系进行了专题讨论(张人杰,1989)。特纳认为,功能主义下每一个社会都必须解决如何维持个体对该社会制度的忠诚态度的问题。特纳假设“在一个形式上是开放的并且向大众提供教育的阶级制度中,人才选拔模式决定了社会地位的升迁模式,这一点是形成学校教育制度的关键,它甚至比社会地位升迁的程度还要重要”。社会精英的流动过程主要以美国、英国为代表,有两种

社会流动方式：赞助性升迁流动与竞争性升迁流动。前者的主要特点在于，已有的精英及其代理人来选择将来的精英，而要取得这些精英地位，必须对个人品质和德行进行某种假定而并非个人努力就能实现。就拿进入私人俱乐部来说，个人需要该私人俱乐部既有成员的引荐和帮助。后者的特点在于，为实现精英地位公平竞争的目标，必须为竞争制定公平的制度保证。竞争者自身的努力程度决定着向上流动的成败，这向那些追求理想并努力向上实现社会精英地位的人们释放了一种积极信号。精英地位标准的确立及其内涵需要被大众广泛接受认可。升迁性流动过程及规则对教育制度产生了恒定不变的作用力，要求教育制度和升迁性流动的步伐保持高度一致，与赞助性升迁流动、竞争性升迁流动分别造就了相对应的学校教育制度。因此，不同的社会精英筛选规则决定了学校教育制度的生存态势，反过来，学校教育制度又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个体对社会制度的虔诚。在对特纳教育选择的基本思想进行吸收借鉴的基础上，霍珀进一步提出了“教育制度分类的类型学”概念，认为教育应该有三个阶段，并时刻思考着教育选择的几个基本问题：如何选择？何时选择？谁入选？为何入选？

以职业地位为核心的阶层生产（代际传递）功能主义理论认为，伴随着经济和技术不断融合发展，职业结构将日益呈现出开放性和流动性的特点，教育在社会地位建立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然而，阶层生产功能主义理论在强调教育获取社会地位作用的同时，却忽视了其他非关键因素在代际传递对社会分层模型延续或再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如生产关系、文化资本和阶层背景等。有别于功能主义理论的一个观点强调，相较于先前工业社会，虽然教育作为地位和资源分配机制是一种进步，但这并不一定暗含出社会平等或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在工业化社会中，教育机会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源之一，其对所有大众是否真正具有开放性，还是说只为某些社会阶层垄断，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须联系家庭的背景，具体而言，需要充分考虑教育机会在父代和子代之间的关系，否则，工业化改变的只是结构化的机制，而没有改变社会分层模式的继承性的实质。众多研究发现，表面上看教育的机会是平等的，但鉴于教育代际传递的特性使得职业流动上的模式并没有得到改变，教育是社会地位再造的重要机制。教育在父代和子代代际传递中的连续性的特性，使得教育技术-功能主义倍受冲突论学派的质疑。冲突论学派通过反复的研究和众多事实观察发现，有必要把冲突论引入现有的分析框架，以推翻现有以功能主义为主的固有思维。冲突论学派的主张关键在于，教育的功能之一是对现有社会地位的重新建构。在教育功能论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韦伯理论构成了分析的基本逻辑框架，布迪厄则以文化资本作为研究视角，对教育复制和社会结构再生产的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综合及超越马克思和韦伯基

本理论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

三、教育的再生产理论

(一) 生产关系再生产机制

对教育再生产社会结构机制进行研究,另一个研究视角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发,马克思、鲍尔斯与金蒂斯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在这些代表中,以鲍尔斯与金蒂斯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最为典型。“每个社会都必须,也愿意奖赏一些优秀人物。但是奖赏哪些人,以什么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并通过何种社会过程来奖赏,主要取决于经济生活是如何组织起来的。”(鲍尔斯,1990)言外之意,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着其精英培养和选拔过程。鲍尔斯指出,遵循与经济结构相一致的原则,教育的两大目标是对劳动力和生产关系进行重新塑造,功能论者的观点中所隐含的技术决定:不考虑阶级属性的情况下,选优任能论认为教育仅仅是提供认知技能的过程。首先,源自学校培育的认知技能和个人未来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这一点明显区别于功能论的认知和技能决定个人未来社会经济地位的观点。其次,多层次教育培养体系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职业技能者,因此,教育系统也逐渐形成了与等级制劳动分工相类似的内部组织结构。学校的类型和层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生的学业经历及未来可能达到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各阶层和各集团的人都可以通过学校教育获得相应的技能,进而通过职业技能获得相应的职业地位。学校培养体系中,通过教育功能对某些能力和需要进行针对性的奖罚,最终实现了社会劳动分工相适应的功能,抑制具有自我个性及社会阶级身份的发展的效果。总之,社会经济地位中个人特征的培养离不开学校的培育、奖罚和赋予(鲍尔斯,1990)。

(二) 文凭制度理论

柯林斯的文凭主义把研究视角聚焦在教育和社会阶层方面,柯林斯(Collins,1979)认为,教育以文凭为中介作用于社会分层,文凭既是教育的结果和证明,又是现代社会中的文化通货。在现实竞争中,拥有文凭者想要垄断社会及经济地位时较无文凭者的优势更为明显。这一结果让产生文凭的主阵地——教育市场也成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争夺的对象。学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在教育市场上加大了文化通货的供给力度,各利益群体在斗争中充分利用优势获得文凭,加剧了文凭斗争的激烈程度,斗争也可能造就垄断化的职业。各阶层现有秩序并没

有因教育扩大而带来明显的变化，既有的优势群体依然保持其在文化领域的优势地位。拥有领先优势的群体和其他群体的争夺并没带来教育平等化。

（三）文化再生产机制

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发，认为教育是现代社会中既有等级制度的再造，布迪厄虽然也有类似的观点，但不同的是，布迪厄（Bourdieu，2002）强调文化资本决定着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换言之，布迪厄将文化定义为再生产理论中教育复制社会结构的桥梁，但需要注意的是，文化资本在社会各阶层中并非平均分布。布迪厄认为再生产主要是指社会等级的再生产，即社会各场所中由行动者（个人或团体）所占据的不同位置的继承性传递。而不同的是，社会等级的再生产主要是由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来完成。其中，学校是以教育制度为纽带来进行的特权继承，文化资本主要通过教育资本的形式予以制度化。布迪厄的三种表现形式的资本形态中，文化资本和其他资本之间的关系，文化资本是基础，通过一定的条件在某种状态下可转换为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

基于冲突主义视角，教育再生产认为教育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分配器，通过教育的形式将与社会结构相应的社会利益形式进行内化，从而再造了社会结构。冲突论学派还认为，教育再生产虽然非常在乎教育形式、教育内容等各环节把控，但没有对从过程论中来的教育不平等机制产生过程进行详细阐述和分析。教育过程极其复杂，教育过程中的不平等以及不平等的阶级观念实现过程，不仅充满着主动灌输和被动参与，同时还包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双向互动。因此，本书主要关注的是教育过程中的不平等应该如何内化、内化具体机制以及内化的外在表现形式。

四、社会分层流动理论

在西方理论学界社会分层流动理论包含两方面：社会分层理论和社会流动理论。社会分层理论体系中，有比较典型的以卡尔·马克思（德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以马克斯·韦伯（德国）为代表的三位一体分层理论和以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意大利）为代表的社会精英理论。社会流动理论中，比较有影响的是索罗金（美籍俄裔）的社会流动研究、利普赛特和本迪克斯（美国）的社会流动研究。

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分层研究的总结，对后人研究社会分层结构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马克

思主义阶级理论对阶级的界定标准为经济指标，而经济指标包含众多情况，如社会成员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及社会财富支配等。正如列宁所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了）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①。马克思强调，阶级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产生剩余产品，进而形成私有制关系，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主要有两类群体，一类是无产者，另一类是有产者，两者的对立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阵营，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共同的利益，同一阵营的阶级成员在共同阶级意识的指导下团结组织起来，表现出巨大的阶级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产生的根本原因，阶级斗争是解决这些矛盾、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形式；和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阶级现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退出历史舞台。社会分层理论的开山鼻祖马克斯·韦伯详细阐述了反映社会差异的三位一体分层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结构是多层面按一定规则组成的统一体，在社会分层的标准方面，除了受经济标准（财富和收入）重要影响外，还会受到经济之外其他标准的影响，如社会标准（声望）和政治标准（权力）等。经济、社会和政治构成社会分层的主体，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在韦伯看来，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反映了其所处的阶级地位，在商品市场上，社会成员个体或群体拥有的机会主要由社会成员自身的经济实力（如拥有货币量的多少）决定而非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决定；社会成员的声望地位由一套综合评价指标进行衡量，包括出身门第、教育水平、仪表风度、生活方式等。综合评价指标反映了社会成员在社会有序排列梯队中所处的位次，是社会影响的外在表现；社会成员的权力地位综合反映了社会成员不受他人意志干扰实现自身意志以及支配他人行为能力的大小，在组织安排上主要表现在管理职位上，是政治领域不平等的表现。在韦伯社会分层模型及理论的基础上，众多社会学家发展了社会分层理论，例如，三个阶层论，即根据财富、收入、权力、声望等一系列指标，将社会成员分为上层阶级、中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六个或九个阶层论，即增加住房状况、教育程度、宗教信仰、衣着方式等具体指标，将上、中、下三个阶级细分为上、下两层或上、中、下三层；两个阶级论，即依据职业或工作的性质，将社会成员分为蓝领阶级和白领阶级。

①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是社会分层理论的杰出代表，突出贡献在于以社会成员地位代际变化视角而提出社会精英理论。他认为，虽然社会分层结构在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但社会分层内部上层和下层成员的关系并非铁板一块不可分割。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社会等级结构相对封闭，而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外在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新、竞争和变革成为时代的主流，社会成员的地位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在帕累托看来，天生的禀赋和才能以及后天的努力和教导构成了影响社会成员地位和阶层的关键变量；社会精英集团的各个成员都具有非凡的素质和才干，分布于社会各集团的关键领域，成为各阶层社会成员的翘楚。相反，如果天赋愚蠢笨拙并且生性懒惰僵化，即使出身于名望贵族，最终也会家庭没落沦为社会下层。依据天赋能力的自然条件和掌权与否的社会差异这些判断准则，帕累托将社会成员分为四类：执政精英、执政庸才、非执政精英、芸芸众生。他认为，社会能够保持稳定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执政阶层社会成员的能力才干要普遍高于非执政阶层社会成员，而要保证执政阶层的能力永久高于非执政阶层的重要途径是保持阶层之间的精英循环，通过社会阶层流动的开放，保证“能者上，庸才下”。将非执政阶层中的精英成员上升为执政阶层，将执政阶层中的庸才成员淘汰为非执政阶层，这样才能保证整个执政阶层的执政能力。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阶层间的循环机制，执政阶层的社会成员可能因为没有竞争淘汰而变得不思进取，变得懒惰，执政阶层的能力和才干都会直线下降，最终影响到社会的安定以及自身的领导地位；同时，社会阶层的上行循环通过不畅，相对于执政阶层而言，非执政阶层成员的能力才干就会通过积累而提升，达到一定程度可能会激发改变社会阶层的勇气和革命。因此，社会阶层精英循环机制和通道的不健全是引致社会冲突的源泉，而并非形式上的阶级对立。

索罗金的社会流动理论更多是从社会学意义来剖析的。他认为，社会人口、社会环境、父辈与子女之间的天赋差异是社会流动产生的直接引致因素，社会流动是指社会主体、社会客体或社会价值（由人类活动创造或改造的任何东西）在社会中地位的转变。从社会流动方向上，索罗金将社会流动进一步区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前者主要是指在水平方向上的社会群体之间的流动，后者则是垂直方向上的社会阶层向上或向下的流动。社会阶层产生垂直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通过观察社会个体和社会群体在社会等级秩序中的地位变化，索罗金认为存在于社会成员间经济（财富）、政治（权力）和职业的不平等状况是社会成员流动的诱因。同时，还发现，社会的开放度也会影响到社会垂直流动，开放工业社会的社会垂直流动度要远比封闭社会的社会垂直流动度畅通，并表现出以下特点：同一阶层中父母和子女职业类型比较扩散，同一家庭子女拥有更多的职业选择；